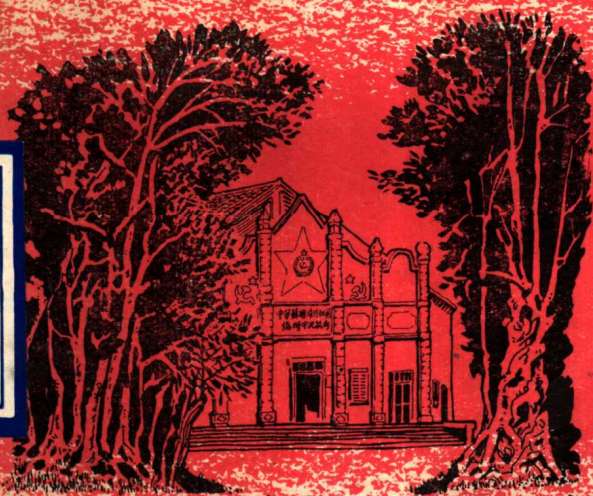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李超钢 李江 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苏双碧

副 主 编：陈君聪

编 委：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许 新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李超钢 李 江 编写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8,000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1040—9/K·152 定价：1.00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李超钢 李江 编写

## 目 录

|                         |    |
|-------------------------|----|
|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   | 1  |
| 二、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 | 7  |
| 三、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 .....      | 17 |
| 四、共产国际与中共三次左倾错误 .....   | 27 |
| 五、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39 |

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列宁的亲自组织和领导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来自欧、亚、美三大洲20多个国家的5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共产国际宣言》和列宁所作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共产国际的建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921年起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22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深深地打下了它的烙印。

##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共产国际成立后，为了推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针对许多国家尚未成立共产党这一情况，共产国际把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各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也需要得到共

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揭开了序幕。

由于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前，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封闭了中俄边境，断绝了中俄交通，给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联系人为地制造了许多障碍。使中国早期的革命组织未能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尽管如此，有关共产国际成立的消息还是通过报刊电台等新闻媒介传到了中国，使正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中国革命者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李大钊曾为此而专门著文，欢呼共产国际的成立。与此同时，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情况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欧洲，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密切关注。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处的领导人之一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派遣维经斯基率俄共（布）小组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人。当时，维经斯基的公开身份是筹办“俄华通讯社”的俄文《生活报》新闻记者，但实际上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考察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后，很快便与从海参崴来华的俄共（布）女党员萨赫扬诺娃和从哈尔滨来京的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会合，立即着手同中国革命者的接触和联系。他们首先通过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俄籍教员的介绍，会见了北大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主持下，与在北京的一些进步人士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

识青年进行了多次座谈。在座谈中，维经斯基一行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苏俄的对外政策，同时也了解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在此基础上，维经斯基同李大钊和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讨论了建党的有关问题。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又前往上海会见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以及《早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时事新报》负责人张东荪等人。在与陈独秀的会谈中，他们又进一步就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为了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维经斯基一行在华期间主要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干部的培养工作。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亲自指导下，华俄通讯社在上海成立。1920年秋，为了培养干部，输送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维经斯基还在上海创办了外文学社，由杨明斋任校长，库兹涅佐娃负责讲授俄文，李达教中文，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彭述之、柯庆施、汪寿华、王一飞等人都是经这所学校选送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在维经斯基的积极支持和具体帮助下，上海首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任组长。其它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在彼得格勒后在莫斯科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60多个政党

和组织的210余名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章程》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明确规定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组织，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政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的绝对领导。各国党的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人都必须由它决定。这对于企图混入共产国际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起到了一定的阻止作用，但是它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缺陷。因为各国革命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瞬息万变的。各国革命的道路和方针、政策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都由共产国际拍板决定。所以这种组织制度不论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还是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都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大会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制定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战略和策略。列宁在报告中提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要“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并且“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在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1920年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巴库召开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中国、印度、日

本、朝鲜、土耳其等国的15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发表了对东方民族的宣言，号召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说：“70年前我们的导师卡尔·马克思发出过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卡尔·马克思的学生、他的事业的继承者们，可以把这个公式加以扩大和补充，我们可以说：‘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大会还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宣传委员会，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用三种文字出版《东方民族》杂志。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共产国际二大的继续和补充，它对于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加强共产国际同远东各国革命者的联系和对远东各国革命运动的统一领导，1921年3月，共产国际正式建立了远东书记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内设置按国别划分的科，如日本科、中国科、朝鲜科、蒙藏科。各科均由该国共产党人主持，也有部分苏俄工作人员。中国科的第一任书记是张太雷。其任务主要是沟通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协助解决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正式开始。

为了加快在中国开展革命运动的步伐，1920年8月，共产国际任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1921年4月，马林由莫斯科动身来华。

6月3日，他化名安德雷森抵达上海。与此同时，受国际工会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斯基派遣的弗兰姆堡、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也先后来华，并很快与马林取得了联系。马林抵达上海以后，立即与李达和李汉俊等人进行了接触，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情况。他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开幕。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应邀出席了大会，并向大会致了贺词。他们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们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且对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工人党员，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奋斗目标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党纲还明确宣布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议中更进一步规定：“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必要时还应派遣一名正式代表前往第三国际。

## 二、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20年代初期，世界形势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又在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大会通过的《东方问题提纲》，提出了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明确指出：“在殖民地的东方，目前所必须强调的口号，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从而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策略方针便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是在1922年7、8月间正式作出的。但是这一策略的形成是经过一个反复比较、不断探索的过程的。

早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与孙中山本人建立了通信联系。此后，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代表又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进行了频繁的接触。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形势十分复杂，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度还不完全明朗，所以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并没有立即把孙中山当作唯一的合作伙伴。在与孙中山进行接触的同时，还曾经试图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正常的关系。维经斯基、马林不仅多次与吴佩孚接触，还与南方军阀陈炯明联系，被他们伪装革命与进步的假象迷惑，错误地认为他们是中国开展民主主义的实力人物。但

是，吴、陈二人很快便暴露了真面目，迫使共产国际放弃北吴南陈策略，转而加紧了与孙中山的积极合作。

马林在第一次使华期间，为了了解国民党的基本政治倾向和阶级基础，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和接触。1921年秋，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受了国民党给他的去广西桂林孙中山总部访问的邀请信。1921年12月23日，马林化名西蒙博士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在桂林访问期间，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非常融洽的长谈，详细地介绍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情况，并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等建议。孙中山则向马林介绍了国民党的历史和当前的方针政策，同时接受了马林关于改组国民党和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但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孙中山及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则有所保留，仅“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马林的访问，增强了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之间的相互了解，认为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比“甘地更有战斗性。”孙中山在和马林会谈后不久，即打电报给广州的廖仲恺等人，说他见过马林后，心中非常高兴，并且多次称赞苏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1922年3月，马林到达北京，会见了苏俄驻华使团团团长裴克斯，向他提交了两份报告：一份是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是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另一份是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建议苏俄政府派使团到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来。

1922年4月，马林又从北京回到了上海，继续为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进行努力。但是在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换意见时，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斗争的实践，还没有制定出当时阶段的革命纲领和实现革命纲领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简单地认为当时中国的“南北各派政党”都没有“改造中国底诚意及能力，”因此，共产党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一提出，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表示了反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理由。鉴于这种情况，马林只得于4月24日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以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7月17日，马林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详细汇报了他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认识。他说：“由于华北华中一带为军阀所统治，只有孙中山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在今年正月海员罢工期间，国民党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因而他认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多阶级的联盟。基于以上认识，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同国民党合作，不要对国民党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合作的具体途径就是“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

活动。”马林汇报后的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便正式决定接受马林的建议，并且要求“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菲利浦同志（马林）密切联系下进行。”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又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作了如下指示：一、根据马林的报告，代表的所有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为基础。二、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三、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以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四、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由于国民党在南方政府中负实际责任。它暂时需要避免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

这一指示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指出了国民党的性质，阐明了共产国际对于国民党的态度，正式确立了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在马林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八月指示中，明显地存在着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估计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作用的错误倾向。这对于日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派马林

第二次来华。恰在此时，马林得知苏俄政府拟派越飞为驻华外交代表，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消息，便于8月12日随越飞使团一起抵达北京。

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法租界再次与马林会见。他对马林说，现在感觉到与苏俄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在这次会见中，孙中山接受了马林提出的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政治主张，决定了联俄、联共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制定与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先在莫斯科后在列宁格勒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东方各国共有131名正式代表和17名非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代表团由39名正式代表和5名非正式代表组成。张国焘为团长。团员有瞿秋白、任弼时、俞秀松、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柯庆施、林育南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还有国民党代表张秋白、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这次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和瓜分中国的阴谋。共产国际东方部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专门作了题为《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强调了共产党人应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立场。大会对中国问题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列宁虽然因病

未能参加大会，但仍抱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询问国共两党合作是否可能，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这次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制订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政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2年上半年，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员陆续回到中国。与此同时，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奉命到中国指导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4月，为了出席并指导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达林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骨干先后到达广州。在达林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了有20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的方针以及国共统一战线问题。会上达林传达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指出了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会议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虽然在认识上仍未达成一致，但多数人对统一战线的问题表示了基本同意的态度。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第一个声明。它明确表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以便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转变自己斗争策略的一个重要标志。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以及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精神，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且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同时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而且还确定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具体计划和步骤。这个决议案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但是，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实际上是一种两党平行合作的联合战线，这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当时所不能同意的，与马林提出的在国民党内进行合作的想法也有较大的出入，为了说服中国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马林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等人。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和“八月指示”，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会议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李大钊基本同意马

林的意见，但张国焘等人坚决反对。而陈独秀则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但必须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孙中山本人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否则，他也坚决反对。最后，经马林的耐心说服，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样，共产国际关于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最后确认。

共产国际十分关注中国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1923年5月，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然而由于路上耽搁，中国共产党直到7月18日，中共三大结束以后大约一个月，才收到这个指示。

1923年6月12日至6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